

汪丁丁 主编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 第一卷 ·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王 晟：国家竞争下的产权制度演进

Vartuhi Tonoyan, 姚明龙：

信任的黑白两面性：腐败与企业家角色

——对新兴和成熟市场经济的跨文化比较

浙 江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浙 江 大 学 民 营 经 济 研 究 中 心
浙 江 大 学 跨 学 科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汪丁丁 主编

· 第一卷 ·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第1辑 / 汪丁丁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4
ISBN 7-308-04203-0

I. 新... II. 汪... III. 政治经济学 - 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375 号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责任编辑 徐丽静

封面设计 张磊

排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300 千

版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500

书号 ISBN 7-308-04203-0/F·564

定价 39.00 元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卷)

The Review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主 编 汪丁丁

副 主 编 金祥荣

编辑部主任 张旭昆

编辑部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叶建亮 叶 航 陈志俊 罗卫东

罗德明 钱彦敏 曹正汉 黄先海

蒋岳祥 董毅青 潘士远

为《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序

汪丁丁

今日中国之政治经济学,应兼有西学之析理及本土之道义。这是我们的主张,也是我们创办《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要旨。

理论的运用,谓之“实践”。经济学的运用,是以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置身于具体问题的情境之内,获得所谓“问题意识”,提出真问题,求得真解释。依赖于具体情境的理性分析,谓之“情境理性”,其经济学的部分,谓之“有场景的经济学”——“场景”与“情境”,西文原本是相同的。情境——situation,特指本土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社会习俗、心理状态、自然的与文化的传统,举凡影响微观行为的一切本土因素,概属于“行为”所在的“情境”。

若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则不妨停留在纯粹理性的层面,与实践毫不相干。这一纯粹理性的层面,固然十分重要,犹如康德所论先验理性之为实践理性的必要前提。但停留在纯粹理性层面上的经济学还不能成为“政治”的——典型如“帕累托最优”概念,不涉及利益冲突,故而不能成为政治的概念。甚至“帕累托改善”概念,如果只是一个定义,也不会涉及现实世界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活动,故而也不能成为政治的概念。

可是,只要我们试图把经济学“实践”起来,试图改革现实世界里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就会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是永远地置身于利益冲突当中的。这一基本的问题意识,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它渗透到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当中,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工资、赋税、劳动、资本、土地、金融、财政、环境与公共物品,概莫能外。置身于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的利益冲突当中,寻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这一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它的古典形式已经由斯密、李嘉图、小米勒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不同的表述,大致可概括为:在“资本与劳

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

同样的政治经济学主题,它的现代形式,经由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各自所代表的基本思路,获得了不同的表述,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它的前沿专题,就今日所见,大致是关于各类公共政策的理性基础的基于博弈论的论证。

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新政治经济学,因置身于西方社会的特定情境而密切地依赖于代议民主的或立宪的制度场景。但是,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境内,我们同样地感受到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之间的甚至是与日俱增的利益冲突,我们同样地感受到资源浪费所带来的生存压力,故而,我们同样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就这一意义而言,西方学术传统中的新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最主要的理论资源。

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依假设不同而有不同的当代版本。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就布坎南的立场而言,阿罗所论证的“不可能性”,恰恰意味着个体自由、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从而恰恰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

这份刊物的名称,“评论”一词尤其要紧。它并非要对应于英文里面的“review”(直译作“回顾”)——因为目前国内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刚刚开始,尚乏善可陈,无可“回顾”。这里的“评论”,直截了当就是汉语的评论——针对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发出各式各样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声音。

基于上述的主旨,我们向社会各界广泛征稿。任何稿件,只要符合学术规范且渗透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都在我们审阅的范围之内。“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谨以此语,与天下学人共勉。

征 稿 启 事

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汪丁丁教授任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是一份综合性的经济学理论刊物,刊登经济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论文。藉创刊之际,向海内外学者同仁广纳贤言,感谢赐稿!

投稿体例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设“综述”、“论文”、“评论与回应”、“书评”四个栏目。“综述”栏目发表关于某一领域最新学术动态的综述性文章；“论文”栏目发表原创性的理论和经济研究文章，文章长度不限，欢迎10 000字以上的论文；“评论与回应”栏目发表对已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的评论和原作者的回应；“书评”发表通俗、可读的中文经济学新书的介绍和评论。以下为投稿体例。

一、稿件一般使用中文，作者投稿时应将打印稿一式三份寄至：

杭州市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

邮编：310027

或通过电子邮件寄至：cec_dyq@zju.edu.cn

二、稿件的第一页应该包括以下信息：

(1)文章标题；(2)作者姓名、单位，以及通信作者的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地址；(3)感谢语(如有最佳)。

稿件的第二页应提供以下信息：

(1)文章标题；(2)2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3)三个中文关键词；(4)文章的英文标题、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和作者单位的英文名称；(5)200字以内的英文摘要；(6)三个JEL(*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分类号。

三、文章正文中的标题、表格、图、等式编号必须连续。

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编号，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三级标题用1、2、3等，四级标题用(1)、(2)、(3)等。一级标题居中，二级及以下标题左对齐。前三级独占一行，不用标点符号，四级及以下与正文连排。

四、每张图必须达到出版质量，并打印在单独的一张纸上。行文中标明每张图的大体位置。

五、文章正文的脚注必须每页重新编号，编号格式为：①，②，③……

六、文章中的定理、引理、命题和定义等单独成段。定理、引理和

命题的证明(如果有的话)安排在文末的附录。

七、翻译外国人名请附原文或直接采用原文。专业术语的翻译请尽量规范化,在较为生僻或可能引起歧义的情况下请附原文。

八、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出现在文章的末尾,并按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或英文名字)顺序编号排列。体例如下:

[1] Acemoglu, Daron and Thierry Verdier, 2000, "The Choice Between Market Failures and Corru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1), pp. 231—257.

[2] Barro, 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5,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3] 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4] 汪丁丁,“行为、意义与经济学”,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14—20页。

文中对文献的引用采用如“Bcker (1968, pp. 168)指出……”、“报酬递增……(Romer, 1986)”,或“正如琼斯所言:‘……’(琼斯,2003,第18页)”的形式。

九、本刊在收到稿件后的三个月内给予作者是否录用的答复,在三个月之内没有接到本刊录用通知者即可另投他刊。稿件如被录用,作者须将文章用与中文 Microsoft Word 兼容的软件录入,并将软盘寄至编辑部,或将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寄至:cec_dyq@zju.edu.cn。本刊因人力财力有限,恕不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并不要在信中央带现金或邮票。

十、稿件发表前,本刊将把排版清样寄给作者,由作者校对稿件。稿件发表时,本刊将向作者提供3本样书,作者如需更多本,请付费购买。

目 录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汪丁丁(1)
大国博弈分析——崛起的新视角	吴 聃 高 莉(11)
国家竞争下的产权制度演进	王 晟(30)
跨国经济增长:同质性或异质性?	李志宏(49)
信任的黑白两面性:腐败与企业家角色 ——对新兴和成熟市场经济的跨文化比较 Vartuhi Tonoyan, 姚明龙	(60)
理解经济波动:一个新的视角	简 泽(80)
公共物品什么时候可以变成私人物品	盛 洪(92)
从偏好到快乐:通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福利经济学	黄有光 (胡芸译)(110)
个体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关系的经验实例研究	朱宪辰(150)
人类食品偏好的进化心理学解释与社会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周德翼(164)
劳动力市场歧视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	姚先国 谢嗣胜(180)
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理论研究综述	唐可月 肖 旭(198)
金融托管:理论与实践 ——兼评《金融托管经典案例研究》	张曙光(214)
征稿启事	
投稿体例	

Contents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China—for Authors and Readers in China	Wang Dingding(1)
Game Analysis of Great Powers—New Angle of Rising	Wu Dan Gao Li(11)
The R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under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Wang Sheng(30)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Homogeneous or Heterogeneous?	Li Zhihong(49)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Trust:Corrup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Vartuhi Tonoyan Yao Minglong(60)
Understanding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a New Perspective	Jian Ze(80)
When Will The Public Goods Become Private Goods?	Sheng Hong(92)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	Yew-Kwang Ng Translated by Hu Yun(110)
Exampl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al Preference and the Genetic Transmission	Zhu Xian-chen(150)
An Explanatiion of Human Food Propensities and Selection Behaviors and Public Roles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Zhou Deyi(164)
Research on 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Western Theories and Chinese Problems	Yao Xiangguo Xie Sisheng(180)
Overall Study on Signaling Theory in the Job Market	Tang Ke-yue Xiao Xu(198)
Finance Trusteeship:Theory and Practice—Reviewing ‘The Study of Finance Trusteeship Case’	Zhang Shuguang(214)

新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变迁 ——写给中国的作者与读者

汪丁丁

引 言

我们创办这份《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目的是要发表那些试图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学术论文与案例研究。为了符合目的，我们应当向投稿人解释：(1)在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提出的任何解释的若干特征；(2)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特征。

如果把阿罗和布坎南视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创建了不同思路的创始人，那么，这门学科的基本解释框架——社会选择理论与立宪问题的公共选择视角，可以说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受到 60 年代的社会大动荡的极大刺激。然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大约三十年的动荡与变革时期。这些变革，在政治领域里最终让黑人和白人女性获得了与白人男性同样的选举权，在经济领域里确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基于“福利国家”理念的税收制度，在文化领域里开拓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知识与意义的批判阵营。这样，当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时候，当初由阿罗和布坎南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主题已经被置于完全不同于 50 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了。

与此同时，就新政治经济学论证的工具而言，博弈论和不动点存在性的数学证明的主要方法——代数拓扑，逐渐取代了由马歇尔和萨缪尔森引入经济学的最优解存在性的数学证明的主要方法——数学分析。对于数学分析的应用而言，任何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达都必须满足某种连续性假设。对于代数拓扑的应用而言，任何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数学表达，只需要引入某种代数运算和拓扑结构，并以此为“代价”，取消往往过于苛刻的“连续性假设”。

基于连续性假设的数学分析，在马歇尔和萨缪尔森关于“个体理性选择”的研究中成为最具优势的工具。但当研究者的视野从个体理性选择的图景扩展到

一切个体的理性选择的整体图景时,社会成员的行为的“结构”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要素之一了。如果我们坚持使用理性选择的个体模型,那么几乎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各式各样的社会成员的个人选择集结为一个“好像是理性”的整体的选择行为。这就是所谓“集结的困难”。例如,宏观经济学解释框架内的集结行为往往看上去更像一位极端理性的中央计划者的行为。所以,哈耶克主张取消“宏观经济学”。

如果我们克服在定义“代数运算”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往往能够对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代数的和拓扑的研究。后者的最大优势在于,我们不必把形形色色的个体选择集结为“看上去理性”的宏观选择。换句话说,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我们可以直接研究政治经济行为的“结构”——偏好结构、产权结构、权力结构。

在上述背景下,当极端理性的“中央计划者”在现实世界里的典型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大规模社会运动摧垮之后,我们被带入了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主要处于“非西方社会”里的人类成员们,被带到这样一个韦伯命题面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仅见于西方社会而不见于非西方社会,因为它们都是西方理性传统的产物。

就“偏好”而言,我们不是西方理性传统的产物。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的“理性选择”是可能的吗?我们的个体选择所能导致的社会选择是怎样的?我们的公共决策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样一种思想努力:一方面,它主要借助于西方思想界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并且从我们自己的生存体悟中寻找具有本土意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我们对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想像的基本框架。而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大范围变迁的历史时期,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想像,又影响了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

一、新政治经济学解释的若干特征

布坎南曾经以下列三个术语概括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不否认“社会”对个体行为的塑形和决定性影响。它只打算为了研究的便利,先从个体行为出发,从一群个体的行为的交互作用出发,解释社会,只要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2)契约关系。这当然是西方思想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以卢梭和罗尔斯为其近代和当代的经典作家,把“社会”看作是一群理性个体让自己的行为遵守一套契约的结果。哈耶克对此提出过同样经典的批评,指出社会必须被视为自然秩序的演化的结果而非任何群体或个体的理性选择的结果。(3)政治市场。这一假设当然是以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为原型的。它的提出者从未设想过要把它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政治过

程。不过,在适当拓广其基本含义之后,尤其是适当拓广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之后,我们或许可以把非西方社会的政治过程看作一群理性个体在政治市场里竞争改善自己的福利的过程。

应当指出,布坎南概括的新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规定了这门学科的“视角”——看问题的角度。这些假设不能规定这门学科必须处理的“基本矛盾”——由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决定的产生了一门学科的全部重要议题的一组相互冲突的原则。事实上,在一位新政治经济学家能够对任何社会现象提供任何解释之前,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社会现象的各种可能解释所包含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这些内在冲突推动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内在冲突,理论家无法向决策者提出确定不移的政策建议。

如上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但它要解释的是“社会”现象,是交互作用着的个体行为的均衡格局,并且这些均衡格局依赖于相互作用着的个体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些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导致了新政治经济学解释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否定了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可比性;另一方面,集体行动或公共选择毕竟有一些特定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要求个体在不同个体的价值判断之间进行比较。

由阿罗和森分别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追随他们的研究者们提出的许多不同版本的不可能性定理,都可以理解为是在各种不同假设下对上述内在冲突的刻画。另一方面,由哈贝马斯和布坎南等人倡导的“对话”原则,可以理解为是从公共选择的社会实践出发提出的缓解各种版本的“不可能性”的政策建议。

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不可避免地包含的另一内在冲突,是“演化”与“均衡”之间的冲突。在已经发表的文献里,我觉得,尚缺乏对这一冲突的详细解释。故而,下面的论述可以视为是对这一缺陷的某种补偿。

在“社会博弈”的理解框架内,我们知道,展开型博弈的经典分析方法,是假设每一社会成员从后向前推导其最优策略的。这一方法,在优化理论教科书里,就是所谓“最优化原理”。按照最优化原理,被优化的问题必须是封闭的,即存在一个有界的时间上限,目标函数——通常是决策主体的效用贴现值沿时间轴的积分,以这一有限时刻为积分上限。根据最优化原理,决策主体从这一时间上限,逆向寻求优化解——即决策主体从每一时刻到最后时刻的策略都是最优的,从最后时刻,一直推演到第一时刻。否则,如果存在一个最优解,它不满足上述最优化原理(必要条件),那么,按照最优化原理的数学证明方法,就可以建构一个解(策略)。它在至少一个时刻比这一给定的最优解有更高的效用并且在一切其他时刻与这一给定的最优解等效用,于是这一给定的最优解就不可能是“最优的”。从这一反证方法可知,上述的逆向归纳法则其实是最优解的必要条件,而

非充分条件。

为什么数学家喜欢“最优化原理”这样一个必要条件,而不去寻找其他的必要条件呢?我觉得,最优化原理大概是最容易运用的一个必要条件。例如,我们经常要运用“庞特里雅金最大值原理”——最优化原理的一个变形。这时,我们几乎总是先从具体问题中推导出相应的庞特里雅金必要条件方程组,然后从满足这组必要条件的解当中寻找那些最优解——借助于所谓“二阶条件”,即充分条件判据。

最优化原理或逆向归纳法则,当系统不是沿时间轴封闭的时候,也就是当不存在一个有界的时间上限的时候,就不适用了。阿罗在研究资本理论时曾经证明过一个“近似条件”,很重要,这里不介绍。总之,当我们假设决策者的视野沿时间轴无限伸展出去的时候,我们无法应用逆向归纳法则。这时候,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必要条件,或者充分必要条件来求解优化问题。

另一类使最优化原理或逆向归纳法则失灵的情况,是当我们引进“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再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时间的不确定性。例如,我们知道自己必定会死但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时刻死。这里出现了决策视野的时间上限的不确定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存在一个足够大的时间上界。我们相信我们必定活不到那个上界,并且从那一上界做逆向归纳得到的最优解可以视为等价于上限不确定时的最优解。不确定性的第二种类型,不发生在时间上限里,而是以世界的可能状态来描述的,是所谓“事件”的不确定性。优化理论对此可以提出一些求解方法。例如,最初被引入金融学,后来在其他经济学领域也有很时髦的所谓“随机过程优化理论”。但这一类最优解太难获得,也太复杂,缺乏直观意义。

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一些博弈论学者提出“前瞻归纳”的分析方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烧掉底线”的囚徒困境博弈——这类博弈的可行策略之一是为强调合作意向而当众烧掉自己可以从“非合作解”得到的回报(一定数额的钞票,必须是可以燃烧的)。后者是博弈回报的底线,故而,这类策略可以叫做“烧掉底线”策略。它向博弈参与者们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警告他们不要假设发信号者不打算合作。就我读到的文献而言,这类博弈究竟可否被纳入传统的博弈分析框架,是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

卡尔·波普曾经指出,制度应当不仅仅是一座城堡的图纸。因为空的城堡,如果没有适合守卫城堡的士兵与之匹配,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制度”。上述的前瞻性归纳的例子,已经包含了人的行为与行为规范之间匹配(或不匹配)的复杂性。

博弈参与者对自己的处于均衡策略中的行为的意义的理解,是可能发生“漂移”的。并且这种意义漂移的积累,足以导致均衡策略的漂移。于是,当采取了均衡策略的博弈参与者打算赋予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某种意义的时候,就会出现

所谓“不确定性”。由于意义可能漂移，每一个博弈参与者都不可能再像以前还没有引入“意义”和“意义的均衡”那样确定地知道每一个参与者的均衡行为的意义。

借用我经常讨论的一个例子——“小姐”，这是一个中文名词。我们听到“小姐”的时候，需要判断当时的场合，从而可以判断说话的人是在“大家闺秀”的含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呢？还是在“歌厅小姐”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包含了不确定意义的语言策略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十分普遍。

意义的不确定性，使任何“社会博弈”都具有了某种开放性，它等待着在博弈过程中进一步加以澄清和确定。由于意义的漂移，出现了多均衡的可能性。任一均衡，它的含义，或者它的核心含义，并不能被参与者们确切地知道。然后，当每一行为个体试图重新解释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重新解释历史的时候，这些意义逐渐被澄清并且发生漂移。

重新解释历史，就意味着我要说服其他社会成员相信我所理解的历史才是正确理解的历史。在这一相互说服的过程达到某一“不动点”之前，在全体社会成员对历史的解释达到一个均衡以前，他们的行为对我而言就可以是不确定的，从而我就处于一个向着未来开放的历史过程之内。

这一内在冲突——均衡概念与演化概念的冲突，其实要求我们追求一种黑格尔说过的“逻辑与历史的同一”境界。只有在那样的境界里，才可能解释被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

在“客观博弈”的理解框架里，世界是静止的，永远不会演化。如果博弈的某一公认的“玩法”——即均衡，被大家知道并遵守了，那么这一均衡就永远存在下去，不会漂移，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变化。另一方面，为了容纳演化概念，诸如青木昌彦这样的作者，在最近若干年里，分别提出了不同于客观博弈的“主观博弈”理解框架。不过，这一思路遇到的关键性的困难是对博弈参与者们的“知识传统”的逻辑描述。这一困难，在本质上仍然是均衡与演化的冲突。

客观博弈可以被嵌入到主观博弈的理解框架里，假设每一博弈参与者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在这些主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非空的交集。否则，博弈参与者们彼此间完全不可理解了。在人生经历和世界观的哪怕极小的重合部分的基础上，博弈参与者们可以建构一套“人类”语言，也就是共同语言。这套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单词的含义，就不会像上述例子中的语词“小姐”一样不确定。也就是说，出现了语词意义的某种均衡格局。又如果这些均衡是纳什均衡，即没有人愿意在非均衡意义上使用这套语言里的任何一个语词，那么，这套语言就可以用编写字典的方式来描述。也就是说，一旦实现了意义的均衡，这套语言就不会再演化了。因此，均衡策略——行为及其意义，也就不会再演化了。这或许就是海萨尼转换的实质——上帝替博弈参与者们掷了第一次骰子之后，其余的事情就是确定的。

但是,如果意义可能漂移,那么,原来是离散的纳什均衡的点集,就可能是一个连续统点集。例如,是一个连续统的实数集合,在这一集合内,均衡连续地漂移。这是否意味着均衡将丧失其基本的意义呢?均衡不再是均衡的了。这里,均衡概念包含了一个逻辑悖论。

均衡作为一个概念,当我们试图把它拓广到可以容纳演化过程时,就出现了上述的那种因意义漂移而来的逻辑悖论。事实上,任何社会现象,例如“制度”现象,都不再如新古典经济学家讨论的单纯的经济现象那样,可以被均衡概念所容纳。社会现象或制度现象,其本质特征就是演化。

但是,为了让理论具有某种实证性,也就是让命题具有可检验性,新政治经济学家不希望放弃“均衡”概念。均衡,这是社会科学的不可逾越的概念。一旦放弃了均衡概念,在理论的不可检验性之外,还发生了实践上的困难。如阿罗和洪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论证过的,非均衡的行为是不稳定的。行为的不稳定性,通常导致社会成员对相互行为的预期的不确定性,这被威廉姆森称为“行为不确定性”。当行为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根据海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理论,任何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理性行为都不再是可调整的。换句话说,人类行为将演变为机械的,如同低等动物的行为那样,只能适应特定环境,不能适应更多变的环境。事实上,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为实践者提供了预期的工具。

均衡与演化,构成一种困境。它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即“知识论”的领域。语言的演化以及语言的逻辑问题,可以被包括在这一领域内。认知科学、演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学科,在上面讨论的视角下,也可以被包括在这一领域内。

二、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特征

如果上面的论述已经大致刻画了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那么,下面的论述可以充分显示出与中国社会实践所要求的理论能力相比,现有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能力是何等地渺小,尽管,它的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且它已经能够分析大大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围的现实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为了提供一个能够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及社会现象的足够宽泛的理解框架,我在几篇论文里概括过中国社会变迁的三大特征:(1)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经济。这一特征意味着中国社会面临着所谓“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怎样在两代人的时间内把由人口生育率转移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而发生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是一切被称为“发展中”经济的社会都面临的问题,所以我称之为“根本问题”。关于“人口生育率转移”的经验研究及其普遍性,读者可以查阅任何一本人口学教科书。从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发生出来的派生问题,包括教育问题、传统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